

始于技术 终于文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

在“金九银十”的季节里,取得最大收获的现象级事件已然诞生: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海内外,获得了全球意义上的成功;华为新品发布会堪比“科技春晚”,三折叠手机“黑科技”盛况空前;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讲述二战期间“中国渔民拯救英国大兵”的故事,所获评分是目前为止本年度最佳。

从放出第一个预告开始过了四年,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终于掀起了“悟空热”,在上线当天刷出120万人同时在线的纪录,并持续霸榜全球多地热玩榜。最新数据显示,该款游戏全球营收70亿元,且来自国外的比例越来越高。《新周刊》用“文化的输出、技术的胜利”,评价其在商业和文化上取得

的成功。

首先是“文化的输出”:从1961年的《大闹天宫》动画片开始,一路经过经典86版电视剧、电影《大话西游》、动画版《西游记》直至最新款的《黑神话:悟空》,共同构建了《西游记》IP进化史。从神魔设定、战斗场面、冒险属性到反抗精神,《西游记》几乎拥有流行文化一切吸引眼球的元素,有足够的空间支撑每一代的艺术家进行改编、解构和延展。《黑神话:悟空》引爆的“悟空热”以及游戏中大量包含“中国元素”的“考古热”“文旅热”,不仅停留在华语流行文化圈,还实现了反向文化输出。

其次是“技术的胜利”:《西游记》IP的进化,不仅仅是文化传承的

问题,更是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过程。《黑神话:悟空》的横空出世,象征着我们终于有相当程度的技术能力,将文化、传统、艺术以更现代的方式呈现。动画、优化、特效、美术、界面,是游戏本身存在的基本,一部优质的3A游戏,每一帧都是技术力的集中呈现。

至于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系,《黑神话:悟空》的出品人冯骥说得很好,“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受众,就像送一件礼物,硬塞的别人不一定喜欢,用画面、特效这些漂亮的‘装饰’包装起来,人们才会有兴趣。而打开包装

后,他们自然会欣赏到最打动人的东西——文化内核。”

相较“黑神话”的技术、文化“双出圈”,华为三折叠手机则以“黑科技”为世人瞩目。《中国新闻周刊》说,华为在这款三折叠手机中秀出了首创的“天工铰链系统”,在铰链和屏幕等折叠屏手机重要核心部件上实现了突破;可以实现双轨联动下的内外弯折,内能抗挤压、外能抗拉伸,这也是三折叠手机真正走入商用的基础;同时,新机型给用户带来了影像、卫星通话及AI翻译、编辑、摘要等一系列智能助手的新体验。无怪乎《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一个细节:发布会上,“余承东从口袋里掏出折叠触控键盘说:‘我的梦想是把平板放在口袋里、把电脑放在

口袋里’的那一刻。”更值得注意的是,华为选择和苹果手机在同一天举行新品发布会且不下落风,再次证明了科技不仅赋能新质生产力,且能带来荣耀与自信。

随着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很多人才知道,原来韩寒在电影《后会无期》的片尾所写的歌词“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指的是里斯本丸号。1942年9月27日,押送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该船在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沉船时刻,英军战俘跳海逃生遭遇日军扫射屠杀,直到中国渔船到来。200多

名渔民冒着危险从海中救起了384人。正如影片拍摄顾问莱恩·费恩祺所说,这段历史同时展现了人性最糟的一面和最好的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提及,《里斯本丸沉没》摄制组在八年之间走访了近百个英国小镇,采访了150多个战俘后人的家庭。影片中,家属们的回忆拼凑出一个个具体且鲜活的故事,那些遥远的记忆里,是亲人们等待与梦碎的声音。至此,那些死于里斯本丸号的年轻人不再是历史文献中冰冷的数字,他们有家庭,有情感,更有梦想。影片最后,十几位英军战俘的后人来到了东极岛海边,他们都已经是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终于站在了与亲人最近的土地上,能够在82年后郑重地做一次告别。文章最后写道:“三位亲历者已经在2021年陆续离世。电影结束时,很多观众没有离开,直到完整地看完了1816名英军与200位参与救援渔民的名字,这部纪录片是他们的墓志铭。”最能打动人心的,依旧是文化。

■读书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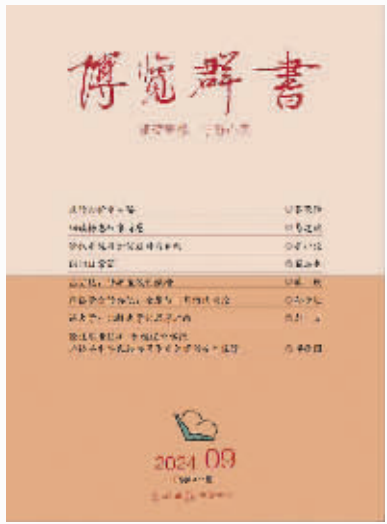
从书院角度看清代科举

《博览群书》2024年9月号,月刊

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制度中,对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思想面貌以及感情状态影响最为深远的,非科举制度莫属。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唐太宗看到熙熙攘攘的读书士子涌入科举考场时,不禁感叹:“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对科举的了解,我们往往是从一首诗、一句谚语中了解的。唐代诗人赵嘏“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句,感慨的是科举制笼络天下士子为之奋斗一生的现象;“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表达的是明经易考,进士难得。两者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科举内卷很严重。所谓内卷,简言之,就是过度的竞争造成了无谓的消耗。事实上,科举发展到清代,更是卷之又卷。清人是如何应对内卷的呢?最新一期《博览群书》刊文给出了解答。

文章是从书院的视角来观察清代科举的。纵观中国书院发展史,“书院”之名最早诞生在唐朝,但彼时的书院只是官方的修书机构,与后来以聚徒讲学为主的书院略有差异。到两宋、明代,书院与官学并立,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教育组织;至明代中后期,官学逐渐失去了其在国家教育中的价值,书院承载“匡冀学校之不逮”的使命悄然复兴,各地开始兴办地方书院,成为广大士子科举之途的新出路;清朝前期逐渐认识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光学校所不及”,雍正下令在各省广设书院,各地官员闻风而起,视兴办书院为“人才之薮、教化之源”。到乾隆年间,新建及修复书院达1298所,总数居历朝之首。

换言之,书院是清代教育的主体,清朝书院学子的内卷几乎是一种常态:一为生



存焦虑,二为发展焦虑。文章写道,在内卷化最为严重的清代,书院做了不少努力,旨在缓解学子的生存焦虑和发展焦虑。

首先是实施膏火助学制度,为寒士提供生存保障。清代以前,书院为士子提供经济补助并非普遍现象。清代乾隆朝及以后,则制定了与成绩绑定的膏火赏资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士子的经济压力,即便考取不了功名,考书院也不失为一条生路。

其次,清代书院制定“成圣贤”“做好人”的读书目标,缓解了士子的发展焦虑。清代的书院师长普遍认为,醉心“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功利性读书、短视读书,是造成读书人发展焦虑的主要原因,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以致内卷化愈演愈烈。于是,许多书院设置了“成圣贤”的育人目标。当然,“成圣贤”的目标过于高远,书院还会设置一个相对平易的目标:做好人。这一目标更接地气、更能缓解焦虑。两个目标的设定,不仅关乎教育的初心,也关乎现实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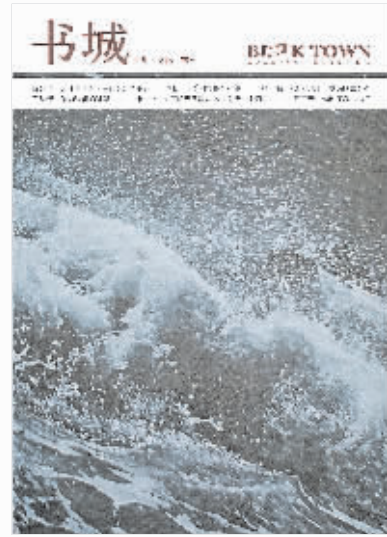
康德是《人间词话》里隐藏的主线

《书城》2024年9月号,月刊

提及王国维先生,读者最为熟悉的是他的《人间词话》和“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自问世以来,新的版本以及学者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且至今仍是年轻人美学的入门书。可见该书的经典地位。为什么《人间词话》会经久不衰呢?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发复旦大学陈建华教授的文章作答。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主要探讨宋词,并从《诗经》、楚辞延伸谈到元曲。这本书虽然篇幅仅有五六千字,却被视为经典之作,是宋词研究的学术基石。作者认为,该书是一部如何欣赏宋词、树立美学标准的指南;“三种境界”表达了追求和发现真理的过程:从登高望远、艰苦探索,最后蓦然回首,真理就在眼前。其中蕴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励志精神。而过往学界普遍认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深受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但陈建华教授始终存在疑问,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人间词话》中所蕴含的积极精神,显然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相悖。

事实上,王国维对于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有涉猎,一些学者早已指出,王国维受到了康德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在《人间词话》的研究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得到充分论证。”陈建华教授对王国维与康德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他指出,早在1904年,也就是创作《人间词话》的四年前,在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中,王国维



已经对叔本华的哲学产生了疑问,认为“叔本华的观点更多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对生活的理解,而非客观的知识论。因此,他转向了康德”。作者认为,《人间词话》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境界”“隔与不隔”以及“以物观物”都与康德有着内在关联。作者认为,“在这部《人间词话》中,康德对王国维的影响正是一条隐藏着的主线。”

接下来,作者剖析了《人间词话》中的一些重要概念:《人间词话》里的“自然”是从康德那里引入的,在康德的认识论里,所谓“自然”,即“自在之物”,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王国维十分看重“气象”这一概念就与康德崇高美学有关,表达了他关于中国文学应朝向崇高的方向发展的看法:“境界”包含多个层面的含义,从中就有王国维受康德影响而来的科学主义倾向。

■文化期刊

9个数字里的河西走廊

《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9月下,半月刊

河西走廊,这片镶嵌在广袤西北大地上的璀璨明珠,是黄河外的绿洲,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的通衢,是边塞豪情与诗歌的沃土,是民族熔炉与艺术宝库,是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和建设。河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上的通道,更是文化、经济、民族交流融合的缩影,在这片土地上,汉唐风韵与西域风情交织,佛教东传与道教西渐并存,它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辉煌的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见证者。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从河西走廊看中华文明”专刊,讲述河西走廊的辉煌历史。

从地理上看,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以西、祁连山和巴丹吉林沙漠中间的甘肃省西北部,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最宽处近200公里,最狭窄处只有数公里,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外界的交通要道。在这里,各民族不断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习俗,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杂志别出心裁地通过9个数字,读懂河西走廊的历史:“1”群石窟;“2”道汉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河西走廊,有两座诗歌中“出镜率”极高的关隘——玉门关、阳关。尽管历朝历代的关隘锁钥不胜枚举,但位置偏僻的玉门关和阳关,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边疆的典型意象;“3”个要塞。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在中原王朝眼中,河西走廊是“张国臂掖”的战略要地;在游牧民族眼中,河西走廊是扼扼乃至进军中原的前哨阵地。在河西走廊设置要塞屯兵防御,成为诸多政权控制河西走廊的不二选择;“4”郡山河。当“4”与河西相遇而成的“河西四郡”,是苍



山如铁,残阳如血的悲壮。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地名能像“河西四郡”一样,与边关、家国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河西四郡”是汉武帝在招降匈奴浑邪王之后在河西走廊地区相继设置的四个边郡,分别为酒泉、武威、敦煌、张掖;“5”座名山。河西走廊由三个地质构造单元组成,分别是南部祁连山和阿尔金山断块、中部是河西走廊拗陷、北部是北山断带。大小山脉连缀其间,构成了河西走廊的地形骨架;“6”大工程。河西走廊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的储量矿产品达66种,各类矿床330多处,潜在经济价值约3128亿元。加之身居内陆,远离边境,这里是多项重大国家工程的发源地或者经过地;“7”位名人。一条河西走廊,半部华夏历史。这条千年长廊上,镌刻下了张骞、霍去病、解忧公主等不辱使命、忠于理想、忠于事业的“孤勇者”,以及他们百折不挠、砥砺前行英雄事迹;“8”朝经营。河西走廊东接黄土高原,西连新疆,北抵内蒙,南邻青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与西域的沟通要道。自西汉始,为了解除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中原王朝始终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9”姓粟特。古丝绸之路少不了“胡商”的身影。这些西域商人,绝大多数是粟特人。由于他们的姓氏集中于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这九种,中原人士也称他们为“昭武九姓”。

最后的石窟殿堂

《中华遗产》2024年9月号,月刊

自佛教传入中国,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往东传,沿途留下诸多精美的石窟造像。唐宋以后,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唯独巴蜀地区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且独具蜀地特色。2021年四川省石窟专项调查工作结果显示,四川现存2134处石窟,其中安岳坐拥230余处摩崖造像,大足约160处。最新一期《中华遗产》特别推出“安岳大足:最后的石窟殿堂”专辑,带领读者一起走进壮美的中国石窟。

唐代时期,中原地区的石窟艺术沿蜀道进入川北广元、巴中,后传播至成都地区,在嘉陵江、涪江、沱江三江流域迅速蔓延开来。在成都至重庆的川渝古道上,尤其是古道中点的安岳、大足两地,石窟寺遍地开花。安岳与大足石窟的开凿史十分漫长,从初唐到近现代,横跨1000多年。古往今来,无数人虔诚受戒,开窟造像,在此留下精美绝伦的艺术。中国石窟史的众多“之最”,独属于川渝之地的安岳与大足,如我国石窟中最大的石刻“涅槃变”。

专辑将重心放在文化的交融上。首先是道家与佛家文化的交流。巴蜀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拥有道教信徒众多。隋唐时期巴蜀地区就出现了隋代道教摩崖造像,全国上下掀起了崇道高潮,道教迎来自身发展的高峰期,相应的有更多道教信徒开凿道教石窟进行供奉、礼



拜。源自西方佛教的石窟造像,与发源于巴蜀本地的道教,在安岳、大足碰撞融合,创造出了生机勃勃的道教造像艺术。大足、安岳常被人们称为川渝的佛国世界,但道教窟却又向人们展示了这里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道教传统。

其次是儒释道合流。儒、释、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博弈与互动,在宋代时出现了三教融通的趋势。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儒、释、道三教的创始人,不分高下地出现在同一个石窟中。在大足石篆山,匠人开凿出三教合一窟,把三教创始人放在一起,成为现存最早的三教合一造像,一同受到人们的尊崇和礼拜。“三教合一”在此修成,潜滋暗长,静水流深。

■地理期刊

山西的墓葬与火山

《中国国家地理》2024年9月号,月刊



最近我国首款3A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遍全球,游戏中令人惊艳的36个实地取景地,27个在山西省,在文旅圈素有“出圈”的山西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新一期《中国国家地理》中,有两篇文章聚焦山西。

第一篇文章关注山西的人文。“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的地上文物如星辰般闪烁,其中最闪亮的星光则属古建筑。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及山西省文物局网站的相关信息显示: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山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享有531处,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有421处,享“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誉。

不过,文章罕见地将目光聚焦于山西的“地下”,具体说是稷山马村砖雕墓。稷山县位于晋南运城盆地北岸的汾河谷地,近几十年,这里发现了大量宋金时期的砖雕古墓葬,为国内考古界所震惊,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马村的“十四陵”。墓葬的砖雕上,有主人夫妇宴饮游戏等图形,但最大的亮点是砖雕舞台、乐队和演员:大鼓、腰鼓、拍板、横笛等多种吹打乐器清晰可见;演员序列行当齐全,包括副净、副末等。有故事情节、有表演技巧、有全套的设备,好似为主人精心准备的一场永不落幕的地下宴会。这样的宴会会在所有墓室中都有,可见当时杂剧是民间的主流娱乐艺术形式。马村砖雕墓是宋金时期的建筑,墓主段家是药膳世家,靠着“孝养家、食养生、戏养神”的家训悬壶济世,富甲一方。墓葬群的砖雕精美,文物考古价值极高,在诸多领域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作者是稷山人,他在文中为我们生动剖析了稷山马村的这片砖雕墓葬群。

三晋大地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也同样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杂志的第二篇文章关注山西的火山。在读者的认知中,火山是我国比较罕见的一类景观。但实际上,在人烟稠密的华北地区、山西省北部就有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火山地质遗迹存在。在山西省的北部,坐落着大同火山群和右玉火山颈群两处规模宏大的火山地质遗迹。其中,大同火山群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东部。在面积约1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30余座火山。从形态上看,有锥形、马蹄形、盾形以及罕见的山麓半锥火山;右玉火山颈群,其实是一个火山残体,当地人称之为“牛心山”。

从外形上看,大同火山群以形态多样的火山锥为特点;右玉火山颈群,则密集分布着具有柱状节理的火山颈,在景观上和大同火山群形成完美互补。但与它们非同一般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不相称的是,长期以来它们受到的关注并不高,因此值得更多的聚焦。